

地方文化研究

· 第八辑 ·

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 编



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

主办

地方文化 研究辑刊

DIFANG WENHUA YANJIU JIKAN

· 第八辑 ·

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谢正强
责任校对:童际鹏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 第8辑 / 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
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7-5614-8413-5

I. ①地… II. ①西… III. ①地方文化—文化研究—
—中国 IV. ①G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0768 号

书名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八辑)

编 者	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8413-5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85 mm×260 mm
印 张	21.5
字 数	526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张小南	刘清友				
主 任	曹顺庆	何建平	王政书			
副主任	彭邦本	潘殊闲				
编 委	(按音序排列)					
	蔡东洲	曹顺庆	邓经武	冯永泰	高大伦	顾航宇
	胡昭曦	黄尚军	江玉祥	李 钊	林 向	刘复生
	刘小兵	栾道成	潘殊闲	祁和晖	沈伯俊	谭继和
	万本根	王 川	王大清	王 方	王学东	王燕飞
	吴会蓉	武小军	鲜乔莹	谢合明	谢应光	谢元鲁
	徐学书	杨嘉铭	杨胜宽	杨 伟	杨振之	袁庭栋
	张 力	张雪征	张在德	张志烈	祝尚书	邹礼洪
主 编	潘殊闲					
副主编	谢应光					

目 录

· 岷江流域文化研究 ·

- 田野视角下的岷江地域考古发现与研究
——以 2013 年度工作为中心····· 陈 剑 (3)
- 望江楼公园几座古建筑的历史变迁
——辑补彭芸荪先生《望江楼志》····· 胡昭曦 (26)
- 丁宝桢对都江堰的治理及其启示····· 吴会蓉 肖 静 (36)
- 晚清到民国时期成都报业文化的变迁····· 刘莉 王方 (44)
- 论红军长征途中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的历史背景
——兼谈《红色画报》第五期反映的红四方面军南下动因问题····· 徐学书 (52)

· 四川名人研究 ·

- 汉赋与蜀赋····· 曾枣庄 (61)
- 唐代女诗人薛涛传奇人生要事论辩····· 祁和晖 (80)
- 宋初书坛盟主李建中····· 王万洪 (87)
- 试析苏轼的安民思想····· 官性根 (98)
- 郑善夫《批点杜诗》辑录及其特色····· 王燕飞 (104)
- 文化地理视域中的明代杜诗传播媒介····· 张慧玲 (118)
- 明清遂宁五大家族及研究综述····· 胡传淮 (128)
- 张问陶后期诗学思想嬗变初探
——张问陶诗学思想发展嬗变研究之三····· 郑家治 (137)
- 解析宋育仁的“复古改制”思想····· 曾绍敏 (147)
- 百年学术现代化转型大波的弄潮儿
——杨超对中华文化探源的十个贡献····· 谭继和 (155)

回归林下，返归自然

——陈硕书法简评 屈立丰（165）

·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

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律保护 张邦铺（171）

最后的“布都木买提”舞 李吟屏（179）

· 地方文化广场 ·

开明氏故地新证 伏元杰（189）

钟离权形迹考 冯广宏（193）

“别来十二月，走到漏天边”

——略论李频的巴蜀之游及诗歌与其他 王定璋（199）

明儒薛侃之宦履行历及著作研考 张克伟（206）

· 理论纵横 ·

天人同一：中国文化解释世界的基本框架 范国英（227）

从公民道德教育的内在张力看校园文化对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 ... 邹波 夏娟 牟星（232）

近代上海方志中的物产概念和文本书写 芦笛（238）

法律视角下的民间契约研究方法探讨 杨廷文（246）

侗族河歌研究的主要方法 胡牧（254）

· 开发与应用 ·

论成都出土文物艺术化再现的途径 冯婵（265）

北京丰台区文化产业（创意）基地的科普产业成长路径 张祖群 王波（274）

· 名人玉屑 ·

人生漫步与人生琐忆 张志烈（289）

成都生活琐忆 蒋维明（301）

· 口述历史 ·

大邑安仁镇人物访谈实录（四） 谢桃坊 伍文（317）

四川老人口述革命经历（中） 何宁（325）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征稿启事（339）

岷江流域文化研究

田野视角下的岷江地域考古发现与研究

——以 2013 年度工作为中心

陈 剑

内容提要：2013 年度，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完成考古勘探及发掘项目总计 300 余项。其中天回镇老官山西汉土坑墓发掘、成都天府广场体育中心古遗址发掘、新津县邓双镇大云山崖墓群发掘、新津县宝墩古城遗址发掘、大邑县盐店及高山古城遗址勘探发掘等项目有较为重要的发现。成都城市考古研究的重要成果，拓展了四川地区科技考古研究的新视野。同时，考古工作重视工作模式的创新，开展公众考古活动，使考古工作的学术效益与社会效益相得益彰。

关键词：田野视角；岷江地域；2013；考古发现

2013 年度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完成考古勘探及发掘项目总计 300 余项。其中主要为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勘探及发掘项目；还有部分为主动性考古工作项目，如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都平原大遗址考古及相关课题研究而进行的考古勘探及发掘项目。取得较为重要发现的项目包括天回镇老官山西汉土坑墓发掘、成都天府广场体育中心古遗址发掘、新津县邓双镇大云山崖墓群发掘、新津县宝墩古城遗址发掘、大邑县盐店及高山古城遗址勘探发掘等。

一、围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子课题及大遗址考古工作的实施，对系列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进行了调查发掘，有助于成都平原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深入化和系统化

新津县宝墩遗址继续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子课题。中华文明探源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2013—2015）（以下简称探源四期）的研究核心是对中华文明形成的时间、地域、过程、原因及机制和早期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等重大问题，提出较为系统的认识，形

成有关中华文明的理论；扩展视野，探讨中华文明与周边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关系，进而通过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总结早期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丰富人类文明起源理论。同时，将工程三期探索出的以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与传统考古工作相结合，多学科联合攻关、协同研究的研究模式扩大到不同地区的考古遗址工作中去。自2013年1月启动以来，在科技部与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下，各课题组顺利开展各自的研究工作。探源工程采取的“点面结合”，即以中心性遗址的考古勘探和发掘与周围地区聚落分布调查相结合，来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的工作方式，和多学科结合，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研究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的理念和方法，日益为学术界所推崇和效法。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不少的新收获。在调查、勘探与发掘各遗址的同时，注意运用多种科技手段，有效收集测年样本，同时为古环境、古代经济与生业的复原研究采集分析测试样本。在过去的一年中，共采集各类标本数万件，为多学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①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3年10月至12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宝墩遗址再次进行了考古发掘，2013年的发掘工作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四阶段的重要子课题之一。同时实施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2011级本科生的田野考古实习教学，有近40名师生参与了发掘，取得重大收获和突破。本次发掘区域主要位于宝墩城址内城田角林东南，与1996年发掘区相接。揭露面积1000平方米，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汉代、唐宋至明清等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宝墩文化时期的遗存十分丰富，有灰坑、房址、墓葬等。基本完整地揭露出了一个聚落区，该聚落区的房址集中分布，墓葬则位于该聚落区西北部附近，与居住区界限明显，清晰显示出田角林区域聚落的布局结构；墓葬均为东北—西南或西北—东南走向。部分墓葬人骨保存较好，为探讨成都平原最早人群的来源提供了很好的材料。本次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玉石器等遗物。陶器中除前几次发掘中常见的器型外，也有不少新器型；石器在常见的斧、锛等类型外，还发现了类似玉石质料的刀和箭镞等。本次发掘还发现了较为丰富的汉、宋两个时期的遗迹。分布于发掘区东部的5处汉代的建筑垫面显示出可能存在较大规模和级别的建筑遗迹。上述发现说明，大体在汉宋期间，宝墩聚落曾有着密集的人类活动。这为重建宝墩聚落4500年以来景观历史提供了直观资料。此次田野发掘在总结以往积累的成功经验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多学科协作的规模，发掘队伍集合了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石器分析、体质人类学、测绘技术、文物保护等领域的研究人员。明确的课题意识贯穿发掘始终，如应用了机载激光雷达遥感，获取了遗址片区的数字正射影像图及地形数字高程模型，并尝试用小型航模对发掘区做了全景记录；建立了田野考古数据库系统；全面应用全站仪、RTK等多种高精度测量手段记录空间信息；开展了系统性环境采样和大规模浮选；对保存较好的人骨骼进行了体质人类学现场鉴别，并将其整体切割回实验室开展碳、氮、锶同位素等分析研究。此次田野考古高质量完整揭示出了宝墩城址内城田角林区域聚落的历史变迁，大大拓展了本科学生的区域考古调查、田野发掘、考古研究等业务能力，顺利完成了预期的教学和研究目标。同时，本次发掘所获信息对解读宝墩聚落的结构、形态具有重要价

^① 常怀颖、高玉：《全方位探察中华文明的早期样貌——“探源工程”四期2013年度工作取得丰硕成果》，《中国文物报》2014年1月17日第5版。王巍：《二〇一三年中国考古学的回顾》，《中国文物报》2014年1月31日第5版。

值,有助于成都平原龙山时代的社会复杂化程度以及文明进程的研究,将提升宝墩遗址研究在业界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使其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四阶段子课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为《宝墩遗址保护规划》的编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①

大遗址保护是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国家在“十一五”计划期间,做出了加强大遗址保护的战略决策,启动了国家主导的大遗址保护工程,明确100处大遗址作为重点保护项目,启动了第一批十二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项目,以10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格局初步确立。“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投入资金约20亿元用于大遗址专项保护。“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预计投入资金100亿元用于大遗址专项保护,形成以15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新格局。2013年,新批准挂牌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12个,批准立项的31个。但长期以来,我国的大遗址考古工作大多停留在初期的发现阶段,缺乏计划性指导下持续的考古工作,尤其缺乏系统、细致的考古勘探,即使是在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首批重点保护的100处大遗址中,完成了全面系统考古勘探的遗址也如凤毛麟角。仅仅对遗址的范围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对遗址内部的布局、功能分区及其变迁所知很少,难以满足制定大遗址保护规划和对遗址实施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的需求。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大遗址的系统勘探,拨出专项经费支持一些大遗址的系统勘探。在一些史前时期的中心性遗址和古代都城遗址,考古工作者配合“申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或“探源工程”等项目的实施,开展较大规模的系统考古勘探。凌家滩、筑卫城、三星堆、丰镐、曲阜鲁国故城、汉长安城、隋唐洛阳城、唐宋扬州城等遗址的系统勘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极大地丰富了对这些大遗址内涵和布局的了解,纠正了以前认识上的一些谬误,为这些大遗址的科学研究、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提供了宝贵资料,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工作收获,充分显示出大遗址系统勘探的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②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2年以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启动了大邑县盐店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并对高山古城遗址进行了调查勘探,作为其拓展项目。2013年度的工作又取得了多项新成果。在高山古城遗址内外区域进行了详细的勘探,总面积近两百万平方米。并在遗址的中部偏西南的地点、西城墙外侧地点选点进行了解剖性发掘,发现了多处房屋建筑基址、灰坑、灰沟等遗迹现象,其中以底部垫圆形卵石的大型柱洞遗迹最为重要。出土石器、陶器数量极为丰富。石器以穿孔石刀、打制的燧石器(包括石核、石片及燧石原料等)较有特色;本年度又发现了一些宝墩文化的陶器新器型,如宽大耳器、直口壶形器等。从出土陶器的风格初步判定,高山古城遗址的年代处于宝墩文化的偏早阶段,还发现了一些略早于宝墩文化的线索,如第⑤层出土部分饰细线纹的泥质灰陶片等。这有助于成都平原建立更为完备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和探寻宝墩文化的渊源。高山古城是时间和空间位置上与宝墩古城遗址关系最为密切的史前古城遗址,其最新考古成果无疑会对成都平原史前聚落的演进及环境的变迁提供新思路和新资料。^③

2013年在高山古城遗址进行勘探和发掘的同时,还在古城的西部及东部的台地上新发

① 何锬宇:《新津县宝墩古城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14》,文物出版社,待出版。

② 王巍:《二〇一三年中国考古学的回顾》,《中国文物报》2014年1月31日第5版。

③ 周志清、陈剑:《大邑县高山古城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14》,文物出版社,待出版。

现两处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其中的祝坟园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位于大邑县三岔镇高山社区14组，处于高山古城遗址西城牆外侧150~300米处的台地之上，地理坐标为东经103.57236度，北纬30.44658度。该台地高出周围地表约3~4米，总面积逾百万平方米。在台地南面地面发现商周时期灰坑遗迹，采集陶片的器型包括甗、矮圈足器、矮领敛口罐、小平底罐等。在台地中部及东部边缘地带发现宝墩文化灰坑等遗迹，出土有较多的泥质灰白陶片、夹砂褐陶片、打制燧石器、磨制的石斧、石刀等遗物。^①成功村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是在高山古城遗址进行勘探和发掘的同时发现的，位于大邑县上安镇成功村与乐善村交界处的台地之上，距离高山古城的东城牆约400米，地理坐标为东经103.58795度，北纬30.45161度。台地面积50余万平方米。勘探发现有10余处宝墩文化及商周时期的灰坑、土坑墓等遗迹现象。商周时期灰坑出土陶瓮、灯盏形高柄豆、小平底罐、鼓腹罐等陶器；宝墩文化灰坑出土陶直口壶形器、磨制石刀等遗物。^②2012年，在高山古城遗址东城牆外侧100米处也曾发现了一处商周时期的十二桥文化遗址（与成功村遗址相隔一条河道）。加上西部的祝坟园新石器时代及商周遗址，自此在高山古城遗址周围共计发现有2处新石器文化遗址和3处商周时期遗址，这在目前所发现的8座成都平原史前城址中是独一无二的。有助于分析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文化演进与环境变迁的互动关系。

此外，2013年度配合基本建设还在温江区、新都区、青白江区等地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和战国时期遗址、墓地。如温江“丰隆城市综合体”建设项目位于成都市温江区公平街办红桥村，地处江安河北岸约50米。2008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四川金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西班牙森林”房地产项目区域进行文物勘探时，发现该区域有一处宝墩文化时期的遗址。2011年底为了配合温江“丰隆城市综合体”房地产项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详细的钻探和测绘工作，确定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面积。遗址位于江安河北岸的台地之上，台地呈不规则形，高出周围0.5~2米，探明遗址的总面积19余万平方米。2011年底和2012年对遗址进行了试掘。2013年6月28日，项目施工方在铺设施工道路的过程中发现了宝墩文化时期遗物，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迅速组织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清理和保护工作，并拟对相关区域做进一步的钻探和发掘工作。勘探试掘中已发现有灰坑、房址、墓葬等遗迹现象。发现宝墩时期的家族式墓葬区，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成组分布，每一组墓葬的墓向一致。出土有陶器和石器，陶器可辨器型有绳纹花边口沿罐、高领罐、尊、圈足等；石器有小型的石斧、镞等。该遗址可以确认是一处宝墩文化时期的聚落址，年代大致处于宝墩文化三期前后。清理出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该墓的墓壁较直，墓底平坦，墓坑长1.9米，宽0.95~1.05米，深1.1米，墓向南偏东15°，人骨保存相对较好，骨架长约1.65米。经体质人类学鉴定为男性，年龄30~35岁。无其他随葬遗物，只在身体左侧发现1件杖形随葬品，与身体平行放置，长约1.04米，横断面略呈方形，下部呈尖状，最宽处约4厘米。杖体的上部可看出为方形，下端是尖头，中间部分被泥土遮

^① 陈剑、周志清：《大邑县祝坟园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14》，文物出版社，待出版。

^② 陈剑、周志清：《大邑县成功村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14》，文物出版社，待出版。

挡。其材质初步鉴定为骨质，疑是象牙（还需进一步做科学鉴定）。由于过去四川未发现过类似物体，其性质目前还不明。目前判断，“象牙杖”大约与鱼凫村遗址同时代，比三星堆出土的权杖早 1000 年左右。该墓葬已被做整体切割搬迁保护。^①

温江天源村遗址位于成都市温江区永宁镇天源村 4 组，北距芙蓉大道约 280 米，西距八一路约 320 米，隆平路从遗址的东部穿过。地表原为农田，地势较为平坦。遗址呈西北—东南向长条形分布，总面积 6.3 平方米，地理坐标为北纬 $30^{\circ}42'47.8''\sim 30^{\circ}42'59.7''$ 、东经 $103^{\circ}54'13.2''\sim 103^{\circ}54'23.4''$ ，海拔约为 530 米。2011 年 12 月温江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在对“芙蓉田园”房地产项目建设进行文物勘探时发现该遗址，2012 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项目地点进行了试掘。2013 年“学府杏林二期”地点的发现与发掘，进一步丰富了对天源村遗址的认识。“学府杏林二期”地点位于天源村遗址的东北部。发掘时间 2013 年 2 月至 6 月，布北偏东 10 度 10×10 米探方 13 个， 5×5 米探方 1 个，发掘面积 1325 平方米。T1—T8 统一划分为 5 层，T10—T14 统一划分为 6 层，其中 T1—T8 的第 4、5 层，T10—T14 的第 5、6 层为商周时期地层。发掘的遗迹有灰坑、卵石坑、墓葬、房址等。清理灰坑 58 个，以圆形坑为主，其次为椭圆形坑，还有长方形坑和不规则形坑。卵石坑 3 个，平面形状均为长方形，坑壁直，底平，坑内填土为黄褐色土，底部布满卵石，卵石之间夹杂大量灰烬，坑壁有一层烧结面。墓葬 6 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坑较浅，人骨保存较差，均为仰身直肢葬。发掘区内发现有大量的房屋基槽及柱坑、柱洞等，其中能确认的房址只有 2 座，均为木骨泥墙建筑，仅保存基槽部分，基槽内有木骨洞。柱坑共计 6 个，平面为圆形，坑壁垂直，坑底平坦，柱坑中部有圆形柱洞。出土遗物以商周时期为主，其中陶器占绝大多数，可辨器型有小平底罐、高领罐、绳纹敛口罐、素面敛口罐、圈足罐、高柄豆、盆、缸、器盖等。还发现有少量石器，有石铤、石斧等。该遗存为天源村遗址的主体遗存。还出土有少量宝墩时期陶器，可辨器型有绳纹花边口沿罐、高领罐、尊等。^② 这一时期遗存较少，几乎被商周时期遗存破坏殆尽。此次试掘，发掘出土大量灰坑，少量卵石坑、墓葬及房址、基槽、柱坑等大量建筑遗迹，进一步丰富了对天源村遗址的认识。

新都区位于川西平原西部，气候温和，降水充沛，境内水系发达，重要的河流有青白江、毗河、西江河等，皆为沱江水系，还有锦水河、饮马河、羊叉河等众多支流。目前新都区境内发现的先秦时期遗址区位与上述诸河流存在关联。新都区东北部目前发现较多遗址，如正因村遗址（西南石油大学地点、正因村安置房地地点等）、朱王村遗址、褚家村遗址、桥楼村遗址、桂通村遗址、“大港建材城”遗址等，并且遗址间相距较近，大体上可以构成面积较广的先秦遗址群。永兴村遗址便发现于该遗址群范围内。为了配合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迁建项目建设，2013 年 7 月新都区文物管理所对该项目施工范围进行文物勘探，发现有先秦时期文化堆积，遂命名为“永兴村遗址”。2013 年 8 月底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都区文物管理所进行详细钻探，并择其丰富区域进行配合性考古发掘。该项目所在行政村为新都

^① 杨占风：《成都温江区“丰隆城市综合体”项目史前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 2014》，文物出版社，待出版。

^② 杨占风、蒋志军：《成都温江区天源村遗址“学府杏林二期”地点先秦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 2014》，文物出版社，待出版。

区龙虎社区永兴村四组，地理位置为北纬 $30^{\circ}50'3.05''$ ，东经 $104^{\circ}14'19.53''$ 。据当地群众讲述，遗址原先为高台地，“大跃进”时期被推平很多。遗址南面水沟原先为大河，近代不断萎缩，北面相去不远为羊叉河。遗址面积据测算约 7000 平方米，此次发掘按正北方向随机布方 5 个，规格为 10×10 米，发掘面积共计 500 平方米。此次发掘历时一月，出土有较多陶器，少量石器，遗迹现象较单一，仅有灰坑。遗址地表略有起伏，但地层堆积层序比较一致。根据土质土色及包含物，将地层统一划分为四层。第 1 层为灰土，土质疏松，厚 35~40 厘米。含有较多植物根系及少量砖石，为现代耕土层。第 2 层为浅灰色土，土质细腻松软，厚 65~75 厘米。含有少量青花瓷片，为明清文化层。该层下发现数座明代早期砖室墓。第 3 层为青灰色土，土质细腻较致密，夹有少量黄土颗粒，厚 0~15 厘米。包含物少，有少量酱黄釉瓷片及残砖，为唐宋时期文化层。第 4 层为褐色土，土质较紧密，厚 15~25 厘米。出土物有花边口沿罐、假圈足式器底、盘口尊、平折沿尊、敛口罐等。发掘区内在该层下发现有较多数量灰坑。第 4 层之下为纯净黄沙土，没有发现人工遗迹及遗物。此次发掘揭露的先秦时期遗迹现象仅为灰坑九座，存在的层位关系为 H4→第④层→H1~H3、H5~H9。大多数灰坑因故难以完整揭露，大体上依据坑口平面形制将灰坑分为四类。第一类为长方形坑，仅发现 1 座，即 H6。H6 位于 T3 中北部，坑口被 H5 打破，坑底打破生土。坑口长约 300 厘米，宽约 120 厘米，坑口至坑底深约 92 厘米。坑壁近直，坑口略大于坑底，坑底平坦。第二类为圆形坑。仅发现 2 座，即 H4、H7。H4 位于 T3 中西部，坑口近圆，直径约 90 厘米，坑壁斜缓，底部略平。坑口至坑底深约 24 厘米。H7 位于 T5 中西部。坑口近圆，直径约 90 厘米，坑壁斜缓，底部略平。坑口至坑底深约 22 厘米。第三类为不规则状坑，发现有 6 座，即 H1~H3、H5、H8、H9。H9 位于 T5 中东部，部分延伸入东隔梁。坑口最长径长 320 厘米，坑壁缓平，坑深约 15 厘米。出土遗物较为丰富，种类主要为陶、石器。陶器夹砂陶数量占多数，泥质陶也有相当数量。夹砂陶以褐陶系为主，有红褐、灰褐、黑褐等，还有少量橙红陶。泥质陶多黑皮或施黑衣，还有少量灰陶、灰白陶、灰黄陶、橙红等。素面略占优势。纹饰比较丰富，有绳纹、弦纹、划纹、镂空、附加堆纹、戳印（三角形、月牙形、圆圈）等。可辨器型有各类绳纹花边罐（有卷、折之分，有一类折沿罐唇边起立，近似“曲沿罐”）、素缘罐（敛口罐、微沿溜肩罐、喇叭口高领罐）、尊（平沿尊、盘口尊）、豆（豆盘为平折沿浅盘，豆柄有的作瓦楞，施镂空）、壶、器盖等。其中，绳纹花边罐、高领罐、尊等最为常见，另有“曲沿罐”、微卷沿溜肩罐、敛口罐富有特征，年代辨识度较高。石器出土较少，种类有斧、镑、凿及砺石等。永兴村遗址发掘面积较小，遗迹较单一，但是出土遗物面貌十分单纯。根据初步整理，H1~H9、第④层出土器物组合、器型特征都相近，年代应大体相近。绳纹花边罐、高领罐、尊等器物组合决定了该遗址的先秦遗存文化属性当为宝墩文化，而“曲沿罐”、微卷沿溜肩罐、敛口罐等与温江鱼凫村 T9⑤、H73，新津柳河村 H3 等相近，表明该遗存年代大体上为宝墩文化四期或略早。上述表明，该遗址为一处文化面貌单纯的宝墩文化晚期小型聚落。^① 永兴村遗址的学术价值有三：发掘揭示了一批共存关

^① 陈云洪、王波、左志强：《成都市新都区永兴村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 2014》，文物出版社，待出版。

系较好的灰坑材料。与各类绳纹花边罐、高领罐、尊共存的敛口罐、微卷沿溜肩罐等与商周时期同类遗物颇有渊源，而此次发掘没有发现任何商周时期遗迹或遗物。值得注意的是，成都十二桥遗址出土遗物也有敛口罐等这两类遗物，致使某些宝墩文化遗址比对十二桥遗址被定性为“十二桥文化”；该遗址进行了土样浮选，并择其植物籽实进行碳十四测年，有望为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四期的绝对年代提供首个准确年代数据，为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的宝墩文化四期（可谓是“考古学文化序列之节点”）基础材料，并鉴于新都区位置特殊性（靠近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遗址同为沱江水系等），这批材料为解决“三星堆文化”渊源问题提供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2012年4月至2013年底，为配合成都市第二绕城高速公路（青白江段）的建设，成都市考古研究所、青白江区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对该公路途经区域进行了详细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经调查，成都第二绕城高速公路（青白江段）所经地带共分布文物点8个，其中，古遗址1个、古墓群7处。沿坨村战国墓葬群所处青白江段4号文物点上，公路里程为K28+680—K28+880，行政位置属于青白江区东部的城厢镇沿坨村十组，中心点地理坐标为北纬30°50′48.1″，东经104°20′47.9″，距成都市31公里。原为清代寂光寺遗址，现已废弃。其中4号点沿坨村地点共布10×10米探方19个，发掘面积约2000平方米，共发掘战国墓葬23座，发掘代号2013QCY，墓葬编号M4—M27。所发掘的23座墓，除1座为上下层同穴合葬墓外，其余均为单人墓。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圻长度在4米以上有4座，3米至4米之间的10座，3米以下的共9座。葬具保存较差，除M4、M5两座从残留的朽痕可辨认均为木质葬具，其余均未见葬具，大部分在墓壁或底部仅见少许灰膏泥。骨架保存极差，大多无法辨别葬式，能够辨认葬式的墓葬仅6座，俯身葬4座，仰身葬3座，二次葬1座（M23）。墓葬均南北方向分布，能辨明头向的，随葬品多与头向一致，以此推测头向大部分向北，4座向南。出土随葬品400多件，以陶器居多，陶器约400余件，包括釜、豆、盖、盏、罐、钵等；铜器30余件，包括剑、钺、矛、镞、斤、印章；另有少量玉饰件。从随葬品判断，时代约为战国中晚期。^① 战国时期的墓葬群在四川地区多有发现，但在成都青白江地区属于首次发现，而且本次发掘的墓葬，数量可观，随葬品丰富，在近年来成都地区考古发掘中也属罕见。为研究四川地区战国墓葬的年代序列以及该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生产生活及葬俗等，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

二、以天回镇老官山汉墓、新津县大云山崖墓为代表汉代至晋代和明代墓葬的考古发现，丰富了成都地区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的实物资料，也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医史研究的突破性成果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位于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成都地铁三号线建设工地的一处西汉时

^① 王天佑、陈云洪：《成都市青白江区沿坨村战国墓葬群》，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14》，文物出版社，待出版。

期墓地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共清理西汉时期土坑木椁墓4座。出土了大量漆木器、陶器、铜器和铁器等文物。其中M1出土的50余件木牍、M2出土的4件竹木制织机模型、M3出土的920余支（编号数量）竹简及人体经穴漆人像堪称重要发现。墓葬位于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土门社区卫生站东侧，当地俗称“老官山”。已发掘4座墓葬，M1、M2、M3为一组，在蓉都大道西侧，呈南北方向分布，M1墓向192度、M2墓向34度、M3墓向35度；M4在蓉都大道东侧北距M1约420米处，墓向148度，均早期被盗。墓葬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建筑方式为先挖竖穴土圹，土圹内置髹漆木椁，榫卯结构镶嵌而成，木椁外包裹青膏泥，椁室内置葬具及随葬品，M2木椁上满铺棕垫，葬俗特殊。其中M1有墓道，平面呈凸字形，墓室长6.24米，宽4.04米，深4.22米，椁室长5.98米，宽3.6米，高2.2米，置双棺。M2无墓道，平面呈长方形，墓室长8.45米，宽5.76米，深5.2米，椁室长7.2米，宽4.5米，高2.75米，置单棺。M3有墓道，平面呈凸字形，墓室长6.4米，宽4.26米，深2.7米，椁室长5.6米，宽3.26米，高2.2米，置双棺。M4无墓道，平面呈长方形，墓室长6.02米，宽4.04米，深2.86米，椁室长4.22米，宽2.38米，高2.27米，置单棺。M1椁室无底箱，M2、M3、M4有底箱，即在椁室底部分隔出0.3~0.4米一层底箱，底箱多隔离出四箱，各箱内多放置随葬品。四座墓葬椁室内器物多遭扰乱，但墓葬底箱随葬器物保存较好，位置基本未变。出土遗物总计620余件（不含简牍），其中漆器240余件，器形有耳杯、奩、几、盘、盒、俑、马等，有些漆器上有精美的云、龙、鸟等纹饰和文字符号，木俑形态多样，服饰有深衣和短褐两类，部分俑身上有彩绘和文字；陶器130余件，器形有罐、鼎、盆、钵、瓮、壶、井、灶等。木器140余件，器形有璧、杖、器座、案、半圆形器、房、织机模型等；铜器（含钱币）100件，器形有弩机、带钩、扣饰、半两和五铢钱币等。M2出土1件玉印。另有少量铁器、竹编器、草（棕）编器等。

M1出土木牍50枚，根据内容初步分为官府文书和巫术两大类。官府文书类木牍举例：第118号木牍“……陇西左右内史一□……”、“……赐者众，《算令》曰：诸……”；第158号木牍部分释文“……皆没以□不占，县……”、“……皆益加朱十钱以均之……”、“……勿治。令诸郡国贾……”涉及内容应与汉高祖时缴纳赋税的法令和汉武帝时“算缗钱”有关，为研究西汉时期赋税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巫术类木牍举例：第206号木牍“□□□□□□□□□治，饮之。女子视欲得男者，禹步三，□□□取□”、“□遣使告天工下□□□□□三而更为七，皆以□□曰东方□□乡七次，以□死。□”，涉及内容应与妇女求子术和禳灾术有关。M3出土医简920支，分两处存放，编号M3—121共736支（含残简），根据竹简长度、摆放位置、叠压次序和简文内容，可分为九部医书，其中除《五色脉诊》之外，都没有书名，经初步整理暂定名为《敝昔医论》《脉死侯》《六十病方》《尺简》《病源》《经脉书》《诸病症候》《脉数》等。编号M3—137共184支（含残简），内容为《医马书》。其中《敝昔医论》简文举例：“敝昔曰：人有九微五臧十二节，皆鼂於气”、“敝昔曰：所胃五色者，脉之主”，论述五色脉与脏腑和疾病的关系；《脉死侯》论述脉象与疾病及死亡的关系，简文举例：“脉绝如□□，不过二日而死，烦心与腹胀□则死”、“[一曰]刑死，二曰气死，三曰心死，四曰志死，五曰神”。《六十病方》包括“题名简”、“药方简”，简文举例：“治纒山十六治鲜卅一治消渴卅六”，所列病名包括内科、外科、妇科、皮肤科、

五官科、伤科等疾病，简文举例：“八治风：石脂七分，蜀椒五分，方风、细辛各四分，厚朴五分，陈朱臬一分，圭十分，姜六分，皆治合”，药方内容十分丰富。《诸病症候》简文举例：“女子红痢，赤白半”、“肠瘴，食多善饥而少气，得之饥”，与妇科病和肠胃病有关。《经脉书》简文举例：“手阳明脉，次指与大指之上，出辟上廉，入肘中，乘腠，出肩前廉，循颈穿颊，入口中。其病□□痛，口辟□□”；《脉数》简文举例：“逆气两辟肘阳明各五及□”、“□病□卧两肱阳明少阳各五”、“转筋足巨阳□各五”；《五色脉诊》简文举例：“凡五色，以观生死……”、“心气者赤，肺气者白，肝气者青，胃气者黄，肾气者黑，故以五藏之气”，所涉及内容极为丰富。《医马书》简文举例：“尽入马鼻…以药灌鼻中”，涉及丰富医马内容。M3出土的人体经穴髹漆人像高约14厘米，五官、肢体刻划准确，白色或红色描绘的经络线条和穴点清晰可见，不同部位还阴刻“心”“肺”“肾”“盆”等线刻小字，比绵阳边堆山汉墓出土人体经络髹漆人像更为精致、完整。M2北底箱出土四部织机模型，由竹木构成，结构复杂、清楚，部件上残存有丝线和染料。其中一部织机略大，高约50厘米、长约70厘米、宽约20厘米，其他三部略小，大小相近，高约45厘米、长约60厘米、宽约15厘米，推测应是参照原织机制作的缩小模型，与织机伴出有十多件彩绘木俑，从俑的不同身姿和身上不同铭文推测有可能为司职不同的织工，应是汉代蜀锦纺织工场实景模拟再现。关于墓葬年代，M1出土有武帝时期五铢，从墓葬形制和其他出土文物综合分析，其时代推测在武帝时期；M2、M3、M4出西汉半两，三座墓葬形制和墓内出土器物与凤凰山木椁墓的非常接近，其墓葬年代推测在景、武时期。尽管墓室被盗，但从墓葬形制和出土重要遗物分析，应是一处有较高身份地位的西汉木椁墓墓地。在M1出土漆器上有“景氏”铭文，文献记载景氏曾为楚之望族，西汉初年景氏贵族迁至关中一带，后景氏一支又入迁蜀地，墓主或与此有关。M2出土多部织机，M3出土医简等文物，这为了解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线索。^①

为配合成都市新津县“宝资山文旅项目”一期建设，2012年9月至2013年5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施工范围内大云山崖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崖墓近70座。崖墓群位于成都市新津县邓双镇金龙村三组，中心点地理坐标为北纬30°24′9.6″，东经103°49′15.7″，平均海拔约455米。墓葬按形制可分为竖穴岩坑墓、竖井墓道洞室墓、斜长墓道洞室墓三种。竖穴岩坑墓多单人葬，葬具用木棺。出土器物包括铜釜、铜盆、铜蒜头壶、铜釜、铁削、铁鼎、陶瓮、陶罐、陶灶、陶井、陶盆、半两、西汉五铢等，时代在西汉中晚期。竖井墓道洞室墓多为单人葬，葬具为木棺。出土器物有铜釜、铜钵、铜棺钉、铁镰、铁削、陶壶、陶鼎、陶罐、陶仓、陶钵、西汉五铢等，时代自西汉晚期延续至东汉早期。斜长墓道洞室墓多为合葬，葬具多为陶棺，少数使用木棺或石棺。出土器物包括铜釜、铜壶、铜车马器、铜弩机、铁镰、铁锤、铁刀、铁剑、铁削、铁釜、陶漆盘、鍍金耳杯、铜印章、陶俑、陶瓮、陶罐、陶仓、陶井、陶釜、陶钵、西汉五铢、大泉五十、货泉、东汉五铢等，时代从西汉晚期延续至东汉中期。从已发掘墓葬看，该墓群墓葬规模巨大、类型丰富、修建规整，墓葬中已出土完整文物400余件，可修复文物2000余件，其中M35出土精美文物百余件，从该墓

^①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织机模型、人体经穴漆人像及大批医简》，《中国文物报》2013年12月20日第4版。谢涛：《成都天回镇“老官山”西汉木椁墓》，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14》，文物出版社，待出版。